

走出王权主义藩篱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葛荃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走出王权主义藩篱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葛 荃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王权主义藩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 葛荃
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201-11608-2

I. ①走… II. ①葛… III. ①政治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1238 号

走出王权主义藩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ZOUCHU WANGQUAN ZHUYI FANLI ZHONGGUO CHUANTONG
ZHENGZHI WENHUA YANJIU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策划编辑 王 康
责任编辑 郑 玥
特约编辑 王 倩□
装帧设计 汤 磊

印 刷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2
字 数 370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目 录

绪 说 / 001

一、现代政治文化研究概说 / 002

(一)现代政治文化的一般理论 / 003

(二)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 / 011

二、传统中国“道”的专制 / 021

(一)道的基本内涵 / 022

(二)孔儒之道 / 025

(三)圣王以“道”治天下 / 028

第一讲 政治价值(一):传统中国的君权至上政治价值结构 / 032

一、价值与政治价值 / 032

二、传统政治价值结构 / 034

(一)君权至上 / 034

(二)父权至尊 / 049

(三)伦常神圣 / 054

(四)均平理想 / 057

(五)明哲保身 / 063

第二讲 政治价值(二):“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实现 / 066

一、人性自觉与人的本质 / 066

二、“人道”原则与对个体人的压抑 / 070

三、圣化:“人”的价值的实现 / 075

四、结语:主体意识的断层与民族精神 / 081

第三讲 政治角色：士人的政治存在与政治心态 / 083
一、道与王的同一和冲突 / 084
二、孔子的选择与士人的政治存在样态 / 090
(一)在道与王的夹缝中求生存 / 090
(二)士人的五种出路 / 093
三、士人阶层的从属参与型政治心态 / 098
四、从士人到知识分子 / 101
(一)知识分子的规定性与士人精神 / 102
(二)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 104
第四讲 政治人格：从小人到圣人 / 112
一、从等级身份到政治人格 / 112
二、小人人格的“反道德”特质及其政治表现 / 116
(一)小人人格特质分析 / 116
(二)小人的政治表现与境况 / 119
三、君子人格的道德特性与政治功能 / 124
(一)君子的道德规定性 / 124
(二)君子的政治功能 / 132
(三)君子人格与君主政治 / 135
四、乡愿与伪君子 / 137
(一)狂、狷与乡愿 / 138
(二)关于伪君子 / 146
五、内圣外王：理想人格与理想政治 / 149
(一)圣论与圣人人格 / 150
(二)内圣外王与修齐治平：儒家文化的理想人生与理想社会 / 155
(三)圣化文化与圣人宰制社会 / 161
第五讲 政治观念与意识(一)：从臣民观到公民意识 / 167
一、君主政治与臣民观念 / 167
(一)臣民的忠君义务观 / 168
(二)权利主体意识的缺失 / 171
二、“尽人皆奴仆”的臣民心态 / 174
三、在实践中学会做公民 / 176

第六讲 政治观念与意识(二):“公私观”三境界 / 182

一、境界一:“以君为本”的公私观 / 182

二、境界二:“以民为本”的公私观 / 187

三、境界三:“以人为本”的公私观 / 195

四、从“以民为本”到“以公民为本” / 197

第七讲 政治观念与意识(三):中国传统制衡观念与政治运作 / 201

一、西方文化中的政治制衡观念 / 201

二、中国传统的制衡观念及其价值构成 / 206

(一)和同论与道义制衡 / 206

(二)道义制衡的价值结构 / 208

三、中国传统制衡观念的困境与观念的转换 / 211

(一)制衡方式:苍白无力的道德规劝 / 211

(二)走出传统制衡观念的困境 / 222

第八讲 政治伦理(一):君臣之道与贤人政治 / 225

一、为君之道 / 226

(一)敬天法祖,尊师重道 / 226

(二)立公去私,任贤纳谏 / 231

(三)励精图治,勤政爱民 / 239

二、为臣之道 / 242

(一)忠君之道 / 242

(二)治民与恤民 / 246

三、贤人政治与清官期盼 / 248

(一)贤人政治模式 / 248

(二)所谓“清官期盼” / 256

第九讲 政治伦理(二):忠孝之道与传统义务观 / 261

一、忠孝三境界 / 261

(一)孝道三境界 / 262

(二)忠德三境界 / 265

二、忠孝之道的逻辑统一与实际选择的两难性 / 269

(一)忠孝统一 / 269

(二)忠孝难两全 / 270

三、忠孝义务与极度扩张型亲情义务观	/ 273
第十讲 政治社会化：传统中国的“教化”之道	/ 279
一、“政治社会化”一般理论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社会化	/ 279
(一)政治社会化与政治人	/ 279
(二)传统中国政治社会化的特点	/ 284
二、教化之道	/ 289
(一)学校教化	/ 289
(二)循吏的教化功能与表彰循吏	/ 294
(三)表彰直言、忠义、孝悌与义门	/ 298
(四)地方绅士的教化功能	/ 302
(五)教化与移风易俗	/ 304
三、政治录用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与庸人体制	/ 307
(一)政治录用与教化	/ 307
(二)庸人体制与精英政治	/ 311
第十一讲 政治哲学之政治信仰：	
政治合法性思维与中国化信仰理性	/ 315
一、合法性理论与中国上古时代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	/ 315
(一)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合法性理论范式	/ 315
(二)中国上古三代政治合法性认识的思维特点	/ 317
二、先秦诸子的政治合法性论证方式	/ 319
(一)“圣化”思想	/ 319
(二)“君天同极”论	/ 320
(三)“主阳臣阴”说	/ 322
(四)“君道同体”观	/ 323
(五)从君主的产生论证政治合法性	/ 324
(六)先秦诸子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理论特点	/ 325
三、汉儒的合法性论证方式	/ 327
(一)从天人关系论证政治合法性	/ 327
(二)与政治合法性相关的理论问题	/ 329
四、传统中国的信仰理性与恩宠政治文化性格	/ 332
(一)思辨理性与中国化信仰理性的规定性分析	/ 332
(二)恩宠政治文化性格：权力崇拜与“造神”情结	/ 338

第十二讲 政治哲学之思维定式(一):

善恶两分与政治主体思维的缺失 / 342

一、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式 / 342

(一)东林士人群体的“非此即彼”认知模式 / 343

(二)“善恶两分”的致思逻辑 / 347

(三)“童稚思维”的文化遗患 / 350

二、中国传统政治主体思维的缺失 / 353

(一)政治主体两层次说 / 353

(二)传统政治主体思维的缺失 / 354

第十三讲 政治哲学之思维定式(二):

托古改制与归返原典政治思维 / 358

一、“托古改制”政治思维定式 / 358

(一)托古思维的源流 / 358

(二)托古改制政治思维定式的致思逻辑 / 361

(三)托古改制政治思维定式的“历史合理”与当下流弊 / 365

二、“归返原典”政治思维特点 / 369

(一)清代汉学的“求是”治学宗旨 / 370

(二)理学批判与归返原典政治思维 / 373

第十四讲 政治哲学之思维定式(三):

比类逻辑与“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 / 381

一、比类逻辑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思维特点 / 381

(一)比类逻辑思维三要点 / 382

(二)比类逻辑与君主政治的认知和运作 / 385

(三)“死的”何以拖住“活的”? / 389

二、斗争哲学与“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 / 392

(一)斗争哲学:“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理念之源 / 393

(二)“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致思逻辑 / 397

(三)“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流弊与反思 / 399

第十五讲 传统中国的公共性探析 / 402

一、传统中国的社会性认知与实践 / 402

二、传统中国的社会性与现代公共性辨析 / 404

(一)价值内涵 / 405

(二)关注的问题与国家组织目标	/ 410
(三)操作方式亦即实现路径	/ 411
三、传统中国社会领域三层次说	/ 413
四、转型中国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承续	/ 415
五、作为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 416
(一)历史认知与历史感	/ 417
(二)主观投射与主观投射过度	/ 417
(三)学术研究的“非唯一功利性”	/ 418
第十六讲 走出王权主义藩篱(代结语)	/ 420
一、王权主义提出的政治学价值	/ 421
二、王权主义提出的政治文化研究价值	/ 422
三、走出王权主义即走出中世纪	/ 423
参考文献	/ 426
后 记	/ 433

绪 说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已然表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大都经过了域外民族文化的冲击、交流与融合。域外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撞和交流,往往会启迪一代人的认识更新,会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完全封闭的民族文化,常常会局限于僵锢的地域性而长期滞后。譬如延续至今的极少的原始部落文化。^①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业已证明,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正是从中国文化中找到了批判欧洲中世纪传统的思想武器,东方的孔孟儒学、老子道家以及中国的文物典章,等等,为启蒙思想家们各种学说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的借鉴。例如,伏尔泰借鉴了儒学的恕道,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形成了自然神论的思想基础;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则得到了儒学经典《周易》和宋儒“理气观”的启发;宋明理学的“天理”学说和儒学的理性精神为启蒙学者们冲破宗教神学的精神束缚,高扬理性权威提供了动力。正如伏尔泰所言:“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②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据约瑟夫·奈讲,他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是受到了中国孔子思想的启发。

无独有偶,19世纪中国的先进人士们也正是从西方文化中找到了打开君主政治的精神枷锁,开启中国近代文明的工具。《富国论》《物种起源》《法意》《独立宣言》的东渐,在封闭的东方唤起和造就了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他们高擎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呐喊、奋进,成为中华民族为摆脱专制而跋涉百年的开路先锋。显见,人类的文明史已经表明,文化的交融所形成的推力能冲垮思想禁锢的壁垒,开拓出一片新天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借助于现代政治学理论的“它山之石”,重新研磨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政治。

① 例如中非的俾格米人、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人、新几内亚的法尤人等。参见刘梦熊:《俾格米人原始部落行》,《资源与人居环境》,2005年第12期。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259、274页。

② [德]科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79页。

一、现代政治文化研究概说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论域,政治文化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不过是近五十年的事情。一般认为,美国政治学家 G.A.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在 1956 年发表的《比较政治系统》一文中率先使用了这个概念;嗣后,政治文化逐渐被政治学界广泛接受,成了一个令人兴趣日增的研究课题,迄今已有数十种专著问世。

政治文化生成晚近的特点表明了这个领域无非是现代科学主义的产物,准确地说,是伴随着人们称之为“行为主义革命”的学术思潮而生成的。

如果我们稍稍追溯一下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史,就会清楚地了解到,在欧洲中世纪之前,政治学基本是哲学和伦理学的附庸,许多颇负盛名的政治学理论家首先是哲学家。这一时期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一些理论命题进行论证,政治思维有着强烈的伦理色彩。例如,西哲柏拉图对于政治的认识就贯穿着道德性,他以道德标准将人划分为三等。其中治国者代表着智慧,卫国者代表着勇敢,劳动者表现为贪婪。他认为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成为国家的最高政治领袖,因为只有哲学家才具有完美的德行,他的智慧使他足以洞解正义,从而得以依照“正义”的最高道德准则去治理国家,而正义的实现恰恰是政治的最终目的。再如,被称为“政治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也以“善业”的普遍实现作为他的政治目的,又以“正义”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他说:“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①显然这一时期的政治认识尚没有超出价值哲学的视域。

欧洲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近代文明的崛起,政治学研究的坐标从道德价值转向了国家、政府、制度和政治权力本身,诸如国家与法、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结构及基本人权等,成了人们思考的热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传统政治学”。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采用演绎的方法,关注的是政治的规范、标准和价值,亦即政治的“应然”方面;至于政治的“实然”方面,亦即实际政治运作过程和在这一过程中活动着的具体的人,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

20 世纪初叶兴起的科学主义思潮把政治学研究推向了现代社会科学的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 年,第 9 页。

行列。基于科学主义的思维方法^①,有人提出政治学不仅仅是思辨的理论阐释,而且应该是为了发现真理,阐释并证明实际存在着的基本政治规律与规则。1908年,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出版了《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他批评说:“政治学的研究目前正处于非常令人不满的境地。”他认为,“目前差不多所有研究政治的人都分析体制而避免分析人”^②,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在他看来,人的理智是有限度的,在政治生活中,人常常不是凭借理智,而是在情感或某种心理的作用下作出反应或选择。因此他主张研究政治中的人,把人性、人的心理、人的行为和人的政治活动的规则、规律作为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沃拉斯的主张在政治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回应^③,人的活动和行为日益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一学术发展趋势正是人们所说的“行为主义革命”。

行为主义革命本质上是方法论的革命,它意味着人们在思维上突破了哲学的束缚,转向了科学;学者们走出了文书档案,开始面向丰富而鲜活的政治现象。这种方法将传统的静态研究变为动态研究,主张采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及其方法论来推动政治学研究,提倡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人的实际行为。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政治学走出了以往的国家、权力、法制领域,研究的热点集中在选民行为、公众舆论、利益集团、政治心理、政治人格等方面,力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对于政治现象更具解释能力的现代学科。

政治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生成的。

(一) 现代政治文化的一般理论

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发展来看,政治文化的源起甚早,几乎与欧洲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④然而作为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则是由美国学者G.A.阿尔蒙德提出来的,他用这个概念来概括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政治

① [哥]门罗·史密斯(Munrot Smith)提出,任何一门能称为科学的学科都必须实现两个目标:其一,目的在于发现真理;其二,能够证明其基本规则。

②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9页。

③ 与沃拉斯相呼应的学者有美国的 Arthur Bentley、Charles E. Merriam、William B. Munro、G. Catlin 等。

④ 据M.布林特在《政治文化的谱系》一书中的分析,政治文化研究的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意识”以及“政治行为的选择倾向”，等等，以此说明隐藏在宏观政治现象背后的微观因素，希望借此能对人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为作出更为深入的揭示。也就是说，在通常人们已经注意到的宏观政治现象和人的政治行为背后，还存在着不为人知的内在文化因素，阿尔蒙德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虽然不能说与广义上的文化没有关联，但是毫无疑问，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论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1. 概念界定

关于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迄今已有数十种，学者聚讼不已，尚无定论。我们且举出三种以为例。

其一，G.A.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①

其二，L.W.派伊(Lucian W. Pye, 中文名：白鲁恂)认为：“政治文化乃由人们对政治过程之累积性的取向所构成，它包括社会权力与权威结构的现状，计算与估量因果关系的规范，价值群和情感反应的模式所形成的限制。”“政治文化乃由界定政治行动所发生的环境的经验信念、表征符号与价值所组成。”“政治文化乃由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形式(order and forms)的特殊取向模式所组成。”^②

其三，W.A.罗森邦(Walter A. Rosenbaum, 一译罗森堡)认为：“政治文化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界定。假如我们着重个人，则政治文化基本上是以心理为焦点。它包括个人主观上对政治系统之基本要素的态度取向的所有重要的表达方式。我们想知道他对构成社会的基本政治秩序的符号、机构和规则的感觉和想法，以及他如何加以反应……政治文化的第二个定义，指人民对于政治系统的基本要素的集体态度取向。这是一个‘系统层次’的研究途径。我们的兴趣在探讨一大群公民如何评价他们的政治制度和官员。”^③

以上的征引代表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政治学界的认识，总的来看，他们

① [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② 唐光华：《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鲁恂》，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84、85页。

③ [美]罗森邦：《政治文化》，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2页。

把政治文化看作是政治中的主观因素,涵指政治活动中的人的主观意识领域,包括人们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信仰、情感、认识、评估,等等。这种界定的着眼点是个人的心理取向(orientation),与前苏联学者的认识大相径庭。这里我们以前苏联学者H.M. 凯泽罗夫的观点为例。

凯泽罗夫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现象,一种特殊的文化,是精神实践活动与某种关系的一定的质和方式,这种关系保证根本的阶级利益得以反映、巩固和实现,其途径是建立一定的政治观点、价值、知识和素养体系,是通过公民参加社会政治生活、保证社会政治设制、规范、传统体系的实行、发展与继承。”^①从凯氏的有关表述来看,他主要坚持了两点。其一,政治文化的上层建筑属性:“政治文化无论具有什么形式,无论它与物质的关系即经济基础关系看上去如何交错复杂,它主要的决定性的特点是上层建筑属性。”^②其二,阶级本质:“政治文化是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反映和实现的特殊形式,这种利益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 and 由这种地位所规定的需求的直接反映,是客观存在的现象。”^③显而易见,凯氏的政治文化更像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狭义的政治文化。

另外,旅美政治学家邹谠认为文化“不仅包括最高深的思想、意识形态,而且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包括存在于社会最底层的习俗、迷信、仪式——特别是在研究中国的问题时,尤其应该注意这一点”^④。基于这样的理解,他认为政治文化“首先就表明政治和文化不可分割。这里的culture已不是过去人们所讲的高层文化,它更接近于我们所讲的日常生活方式……Political culture不是political ideology,它和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不是一码事”^⑤。

吕元礼评论认为,邹谠讲的文化主要指的是观念文化,他之所以特别注重习俗、迷信和仪式等所谓日常生活方式,“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不同于西方现代社会。西方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则是礼治社会。即使在强调法治的当今中国,礼俗及礼治传统仍然发挥着实际的、重大的作用”^⑥。邹谠认为“政治文化中的文化是指接近于我们所讲的日常生活方式,是因为

①② (前苏联)H.M.凯泽罗夫:《“政治文化”这一术语的含义》,《社会学研究》,1981年第4期。

③ 《苏联国家与法》,1984年第2期。

④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出版社,1994年,第49页。

⑤ 同上,第50页。

⑥ 吕元礼:《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这种日常生活方式才是真正为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和广泛流传的态度作风。”^①我以为,邹谠将政治文化与所谓高层文化及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区分开来,或有偏颇,但他突出了作为政治文化规定性的特别之处。

综合上述,我认为,在政治学意义上研究政治文化,当然应该以阿尔蒙德、派伊等人的界定为基准。同时也要参照邹谠之论,注重政治文化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分。据此界定如下:

一般而言,政治文化是政治中的主观因素,指的是一个政治系统赖以生成和运作的文化背景与条件,包括政治价值、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等;当政治文化对政治主体形成影响,表现为某种政治取向(orientation)即选择倾向时,它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的、集团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互为因果,是政治权力结构与制度的内在机制,是宏观政治现象背后的微观因素;如果说,人作为政治的主体具有某种恒定性,那么政治文化的研究就总会是有意义的,因为政治文化的研究视域正是人的内心世界。

2. 构成要素

既然政治文化是政治中的主观因素,那么它的构成就不能不带有思想认识的特点。撮其大要,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认知成分,指的是人们对于政治系统、政治领袖、政治活动及政策的认识。人们运用判断、推理、想象、联想等方法形成对于各种政治现象的了解和理解,构成了政治主体的政治选择与政治行为的主观性依据。政治认识的差异性 is 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包括经济、历史、政治、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政治主体的具体条件,等等。

政治认知的理性程度与人的政治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模糊的政治认识往往导致政治参与意识的弱化和不确定,明确的政治认识是促成明确政治行为的前提。

二是政治情感成分。即人们对于政治领袖、政治权威及政治系统的好恶、憎恨、忠心、淡漠等感情。政治情感的形成取决于多种条件,诸如社会政治地位、人生际遇、政治交往,或是理性认知、价值追求、道德理想、政治信

^① 吕元礼:《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仰,甚至某一突发事件的影响,等等。政治情感有着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受到政治情感制约的行为选择也大多带有非理性的特点。

政治情感的形成和表达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某一群体或集团,有时也会形成全社会的政治情感倾向。

三是政治价值观念。简言之,政治价值是一种评价标准,是政治主体借以认识政治现象,评估政治问题的依据尺度。政治价值一般通过人们的政治观念表达出来。

政治价值可能普遍地存在于某一共同体的政治文化之中,也可能是某一政治主体个人所独具的。对于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而言,政治价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通常需要数代人甚或千百年的传承积淀。对于个人来说,政治价值观念的形成无非是一个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过程。

四是政治理想与信仰。政治理想是对政治前景的设计,是对未来政治局面的憧憬。在民族的政治文化体系中,政治理想是人们进行政治活动的目标,也是激发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的精神动力。对个人而言,政治理想是促使其作出选择的重要根据。

政治理想转化为政治信仰,则会形成一种坚定的、笃信不疑的政治信念,对于个人或群体的行为选择都会形成极大的强制力。

3. 政治文化的结构

政治文化具有结构性,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常常是由不同的亚文化层次构成的。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都可以区分为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两大阶层,与之相应,也就形成了两种政治文化的分野,可以称之为统治政治文化和民众政治文化。前者指的是统治或管理者阶层对于自身在政治系统中的位置及作用的认识,以及相应的政治态度、观念、情感和信仰,等等。后者指的是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自我意识,以及对于诸般政治现象的认识、态度、信仰等。

在政治权力私有即专制政治条件下,统治政治文化对于民众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引导和控制作用,表现为某种文化上的强制和主宰。据此,我们把那些对于全社会具有控制力的政治文化称为主体文化;其他的文化层次,譬如民众文化则是亚政治文化。

由于人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位置不同,从事的具体职业不同,人们往

往从各自的特定角度形成了对于政治现象的认知和评估标准、政治态度及表达方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职业亚文化。这种文化现象不只是近现代社会才有的,事实上,由于古代社会的职业常常与等级身份相连,由此而形成的亚文化特点往往更加凸显。

同辈集团由于年龄相近,他们往往具有相近或相同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态度和政治取向即选择倾向,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亚文化层次。这种亚文化常常可以超越种族、职业和经济政治地位的局限,构成一代人的文化特色,对同一代人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为有着强力的影响。

此外,还有种族、地域亚政治文化,等等。

4. 政治文化的类型

依据划分类型标准不同,可以区分出各种政治文化类型。

例如,根据主体政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以及诸种亚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划分出以下三种类型:

冲突型政治文化。一方面是主体政治文化及各亚文化均得以充分发展;另一方面是政治系统受到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利益集团的控制,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常常是在这种情况下,各文化层次之间会形成激烈的冲突。发生冲突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经济或政治利益分配、种族或民族观念、政治立场或信念信仰,等等。

协调型政治文化。主体政治文化与各亚文化之间有差异,但不存在基本价值、政治原则和政治信仰之间的冲突。文化差异则可以通过某种途径相互适应,也可以通过政治系统或其他方式进行协调。这是理想的现代主权国家的理想政治文化局面。

混同型政治文化。亚文化的发展不很充分,各亚文化之间的界限不甚分明,基本上处于主体政治文化的控制和主宰之下。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种族关系、宗教关系等交缠在一起,政治冲突表现为单一的权力及利益冲突,这样的政治文化类型显然是比较早期的和传统的。

再如,依据社会一般成员对政治的认知程度,可以列出以下三种类型。

地方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的大多数缺乏必要的政治认知,对于政治系统、决策过程以及自身的政治地位、政治能力等茫然无知;或是仅仅对国家、政府(官府)有一般性的了解,但对于具体的政治过程是完全无知的。人们缺乏对于国家的政治情感,不具备对政治的评估能力。他们往往对本地区的公共事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参与取向,但是对于超出本地区的事务却